

2015年互联网自由调查 中国篇

自由之家

<p>自由状况:不自由</p> 	<p>总分: 88</p> <p>(0 = 最自由, 100 = 最不自由)</p> <p>上网障碍: 18 (0 = 无障碍, 25 = 障碍最多)</p> <p>内容限制: 30 (0 = 最少, 35 = 最多)</p> <p>侵犯用户权利: 40 (0 = 最少, 40 = 最多)</p>	<p>数据一览</p> <p>人口: 13.6亿</p> <p>互联网普及率: 49%</p> <p>是否封锁</p> <p>社交媒体/信息及通信技术运用软件: 是</p> <p>是否封锁</p> <p>政治/社会内容: 是</p> <p>是否逮捕</p> <p>博客/通信技术运用软件用户: 是</p> <p>新闻自由状况: 不自由</p>
---	--	--

主要发展: 2014 年6月 — 2015年5月

- 2015年1月, 中国当局以“网络主权”为名, 更新了全国性防火墙, 封锁了数家虚拟私人网络提供商 (见**封锁和过滤**)。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被发现对包括谷歌在内的网站发放假数字安全证书, 使得他们的网站用户易受“中间人”攻击。(见**技术攻击**)。
- 政府加强了对博客、即时信息服务、论坛留言板和网站评论频道实名制登记注册的法律。(见**监视、隐私和匿名**)。
- 2014年11月, 当局制定反恐怖主义法律草案, 要求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商预留系统“后门”和提供加密密钥方案。(见**监视、隐私和匿名**)。

概要：

本报告涵盖期间，在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CPC）继续把“网络主权”当作最重要的政策策略。建立管控的目的在下列几个方面特别明显，即政府对待外国互联网公司的态度，其破坏数字安全准则以及对用户权利的侵蚀，包括通过超法律的拘留和对网络言论采取判刑。*2015年互联网自由调查*显示，中国是全球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

在上一报告期间，[中国]就已经奠定了这种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策略基础。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一个内部讲话中，习近平宣称，“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该讲话首先是由军队和党的评论员披露的，其后*中国数字时报*发表了全文。与其前任胡锦涛所使用的措辞相比，习近平的措辞更加强硬。胡锦涛仅提到要“指导”和“引导”网络上的公众言论。这一新的词汇为此后互联网自由的倒退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更具体的阐述了他的做法，提倡更加严格地控制网络平台的执照，更严格的实名制登记，对政府和民营代理进行更多的信息管理培训，以及加强对不受欢迎的内容管控。鲁炜似乎越来越接近成为习互联网策略的中心，于2014年2月被任命为习近平自己担任领导的信息技术和安全政策小组成员，而该小组领导通常是由国务院总理担任。这一高级别的委员会负责落实互联网发展，管理和安全工作。这项工作与国家安全和经济改革一样，是习近平当局的首要任务。

在过去的一年，再次强调信息管控导致了一系列公开侵犯互联网自由的行动。在本报告涵盖期间，所有谷歌的内容和通讯服务被完全封锁，标志着对该公司中国大陆用户此前几年经历过的审查升级。一家政府机构被发现为包括谷歌在内的许多网站发放假数字安全证书，使得网站访问者易受黑客攻击。这些黑客利用未经确认的假网站来替代真网，以安装恶意软件或者盗窃个人数据。设在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收集了大量源自中国政府自己的审查工具体系对美国反审查网站网络攻击的资料。此前没有相关攻击记录时，中国政府这一名为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的工具被该实验室称为大炮（Great Cannon）。

就如过去数年一样，虽然对海外网站和公司的压力在增加，但打压的真正目标仍然是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在本报告涵盖期间，因为发表合法网络言论被监禁的个人包括著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及70岁的高瑜。对浦的刑事指控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在社交媒体上寻衅滋事；高被以所谓的向一海外网站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判监禁七年。

不过也有一些公共维权行动的例子，反映了中国互联网仍然具有活力的普通现象。例如，五位女权运动人士因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散发反对性骚扰的传单被拘留，她们2014年4月的释放可能与网络请愿有关。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在被审查封锁之前，就已经有数亿人在网络上看过。虽然有这些努力，而且互联网上网也逐年在稳定改善，但互联网管控仍然越来越严。

上网障碍

中国号称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但要上网仍然存在障碍，包括较差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地区；国有企业主宰的通信业；对国际通路的中央集权式管控；为镇压社会动乱不时发生的地方性关闭互联网服务的情况。还有全国性的封锁，过滤及监视系统使得进入国际网站的速度降低或者受干扰。

利用率与方便上网

当局于2015年1月报告，中国拥有6.49亿互联网用户。平均上网速度相对较慢，为3.8兆位/秒（Mbps）。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管理机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资料，自从2011年以来，由于城市市场趋于饱和，采用互联网的速率减缓。虽然城市与农村2014年数字差距略为缩小，但72.5%的互联网用户是城市用户，且中国东部的用户多于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两地区的总用户数。普及率各省不同，包括北京的75%，东南部江西的32%。整个互联网普及率为48%。CNNIC报告，互联网用户的性别差距继续扩大，其中男性的比例占56%。

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移动设备取代固网宽带成为上网首选（这种情况与自2005年来固网宽带取代拨号上网的情况相似）。从2013年12月到2014年12月，移动互联网用户从5亿增加到了5.57亿，占整个互联网用户的86%。

当局对网吧和其他公共上网点实行严格的管控，这些地方由文化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发放执照。到2012年，连锁企业吸纳了大约40%的网吧。中国国内媒体报道，在2011年到2012年，一万以上的网吧被关闭，而到了2013年，只有不到20%的互联网用户在网吧上网。2014年12月，中国政府修改了政策并放松了对开网吧的限制，取消了2013年的一项要求，即网吧必须由连锁店管理的规定，因此导致非法网吧大量出现。虽然在农村和小城镇的需求仍然较高，但2014年整个中国通过网吧和公共电脑上网的互联网用户数持续保持稳定，为18%。

固网宽带服务价格昂贵且效率不高，促进了向移动上网的转移。设在北京的研究公司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Data Center of China Internet）报告，2011年中国大陆平均1兆位/秒的宽带成本是香港的469倍。工信部命令，从2013年4月开始，在光纤网络可到达范围内修建的房屋必须选择通过服务提供商上网。当年8月公布的“宽带中国”的政府策略致力于提高普及率在2020年时达到70%，提高第三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至85%，并将城市的上网速率提高到50兆位/秒，农村则提高到12兆位/秒，并承诺大城市的上网速率达到吉位/秒（Gbps）。

但是到2014年底，整个中国固网宽带下载速率平均仍然只有4.25兆位/秒。其中上海的速率最高，平均为5.3兆位/秒，速率最低的是西藏，平均只有3.26兆位/秒。

联网限制

九家国营运营商持有中国通向全球互联网的通路，使得政府拥有了切断对国外信息需求的能力。所有服务提供商必须通过工信部监管的通路运营商订购此类服务。

对一些特别的事件，政府切断整个通讯系统的连接，最明显的例子是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少数民族暴乱后，对拥有2200万居民的该自治区实行了10个月的互联网封锁。此后，当局还实行了一些小规模封锁，包括2014年9月对新疆叶尔羌（中文名莎车）的那次封锁，当时维吾尔少数民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张，从斋月开始当地的互联网上网和短信服务受到影响。

信息及通信技术市场

2011年，一项针对反垄断的调查指控政府拥有的中国电信公司与中国联通公司滥用其拥有的市场优势操纵固网宽带价格，这是首次利用2008年的反垄断法对国营企业提起的指控。电信巨头后来修改了他们网络间的价格结构，允许竞争者进入他们的基础设施，用户如今可以在20家地方性民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中进行选择，但这只占整个市场份额的10%。

国有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主宰了中国的移动市场，但其他公司可以通过租赁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信服务。据一项报告，高昂的价格减缓了中国采用3G通讯，特别是一些社交平台允许用户使用低成本的2G手机交换信息，这在2013年占了移动互联网上网的31%。2014年5月，政府正式授权上述三家主要公司根据市场力量决定服务价格，导致了价格下降。2015年2月27日，工信部报告该部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颁发了运营4G移动网络的执照。

监管机构

好几个政府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机构负责地方和全国一级的互联网审查，但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整合。2011年成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SIIO），以统一监管网络内容，惩罚违规者并监督电信公司。该机构最早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起办公，在本报告涵盖期间，进行了调整和重组。2014年8月26日，国务院正式授权SIIO监管互联网内容。当年12月，该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推出了新的网站并公布了新的组织关系，隶属于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是2014年2月组建的，直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负

责监管网络安全，从而成为中国互联网政策最高权威机构。当年12月，该领导小组接管给网站颁发数字证书的CNNIC。

另外两个在各自范围内负责审查的监管机构，即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于2013年合并组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一新监管机构的任务包括监视互联网电视与网络视频。

内容限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府机构和民营公司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来监视、审查并操纵内容。许多问题受到系统性的审查，包括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独立评估，对政府政策的批评以及当局对少数民族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审查。在政治敏感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常规性的审查得到加强。但即使如此，与中国其他任何媒介相比，这一高度操纵的网络环境还是给普通网民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或者批评政府的空间。

封锁与过滤

中国政府利用包括自动化的机制和人工监视在内的尖端、且不断更新的审查工具来封锁和过滤批评或挑战个人、政策或事件的材料，这被视为一党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报告涵盖期间，遭到审查的政治敏感事件包括天安门镇压25周年纪念日 and 香港亲民主、被称为雨伞革命的“占中”抗议活动。

在最近几年，审查者们日益加强封锁国际新闻网站，因为它们报道了高官们的腐败和非法暴富，以及其他一系列被认为是挑战政府的问题。国外拥有中文网站的新闻机构成了主要目标。至2015年3月24日，在非赢利新闻机构ProPublic追踪的18家新闻网站中，至少有14家在中国是上不去的。负责这种自动通过技术手段封锁外国网站的系统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防火长城”。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域名或者互联网协议地址（IP address）被封锁，用户可以看到关于非法内容的明确信息。其他的干扰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例如，观察家已收集到有关故意控制网速使其异常缓慢，从而拖延登陆目标网站和服务的证据。

当局还使用深度包检测（DPI）来扫描用户对内容的要求和搜索任何黑名单上的关键字得到的结果。一旦发现这些情况，相关技术就会向交换的双方发出信号，暂时中断联网。用户不易察觉这种细微的管控，因为在被批准的网站中某些网页会被封锁，而且这种中断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技术错误而产生的问题。另外一种经常被用来中断登陆某些特定内容的方法则是域名缓存投毒技术（DNS poisoning），这种方法会给用户提供假网页或者用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上的内容来替代用户要求的网站。在本报告涵盖期间，一些提供内容和服务的网站，虽然没有明确被禁止，但仍然发现自己被暂时中断，因为它们的网

址被另一个黑名单上的网址所取代，被来自中国用户的需求淹没；在至少一起被报道的案例中，搜索被禁、能绕过审查的软件被导向色情内容。

在实践中，过滤根据时间、技术和地理位置而不同。据报道，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安装不同的过滤设备，分别安装在互联网主干线上或甚至安装在省一级的内部网络上，使得跨省过滤成为可能。澳门大学南方广东省的新校园已经在刊登有关无过滤互联网的广告，但在本报告涵盖期间，尚无关于这是否实际生效的报道。2014年台湾和香港发生学生领导的政治抗议期间，审查者试图关闭他们与大陆在网上的互动，干扰大陆进入用来组织游行示威的聊天应用软件，如KakaoTalk 和LINE等，并审查与当时政治发展相关的特定词汇。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软件开发商们，都已开发出了提供进入虚拟私人网络（VPNS）的应用软件，这些软件能够对用户的浏览加密并重新引导至防火墙外的服务器以绕过过滤。据环球网络指数（GlobalWebIndex）的数据，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号称拥有近9300万虚拟私人网络用户，为全球之最。

2015年1月，中国当局报告对封锁好几家虚拟私人网络提供商的全国性防火墙进行了升级，这些提供商包括设在塞舌尔（Seychellers）的Astrill，设在美国的StrongVPN以及在瑞士注册的Golden Frog等。官员们宣称，升级是为了维护“网络主权”。加密的互联网活动即使不经常被中断，也容易引起监视。

某些在全世界流行的网络应用软件被完全封锁，将中国的公众隔离在由用户产生内容的全球网络之外。据监视中国内容的机构大火（GreatFire.org）的资讯，在名列Alexa全球1000大网站中，2014年有169个被中国封锁，高于此前一年的62个。这当中包括谷歌、脸谱、Flicker、SoundCloud和WordPress。2014年5月，在天安门镇压25周年前五天前五天，谷歌在中国剩余的其他服务全部被封锁，包括谷歌地图、翻译、日历和学者、至2015年5月，这些服务仍然没有开通。但据设在伦敦的卫报资讯，为网站拥有者提供受众数据的谷歌分析则没有被封锁。其他诸如照片分享平台Instagram和Viber等社交媒体服务在震动香港的2014年秋季雨伞革命抗议期间也被封锁。2014年7月，Instagram被从中国服务商百度、小米、豌豆荚、奇虎360、腾讯和91无线运营的安卓网络运用软体商店移出。此前下载Instagram软件的用户仍然可以使用该软件，但如果在中国移动的3G网络上，则不能使用，该网络从来不允许进入Instagrm的服务。

许多社交媒体运用软件为中国大陆市场生产清洁后的版本。2012年，印象笔记（Evernote）公司在中国大陆推出单独的服务，其使用条款经修改后包括了九种“不受欢迎的信息”的名单，并在2015年1月废除了公众通知的功能，该功能曾被用来分享有关香港雨伞革命的新闻和信息。2011年被暂短封锁的领英（LinkedIn）于2014年初推出了中文版本。该公司首

席行政长官杰夫·韦纳（Jeff Weiner）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们反对审查……[但]为了达到我们期望能够给予会员的规模，这也是必要的。”用户的内容在中国看不到时，领英会通知用户。

搜索要求中包括黑名单上的关键词时，也会引起中国审查工具的关注，从而会出现空白或者非常有限的结果。2014年，在镇压由学生领导的天安门抗议25周年到来之前，审查日趋严格，包括“重返天安门”“89”“8的平方”和每年举行大规模烛光守夜的“维多利亚公园”等词汇都被列入审查。5月，一博客报道由用户产生内容的百度百科网页上出现了1988和1990年的词条，但没有1989年。

甚至连著名活动人士的姓名也经常被封锁，例如本报告涵盖期间被封锁的姓名就有2014年5月在北京被拘留的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和因在网上发表维护维吾尔权利的文章而被以“分离主义”罪名判终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在本报告涵盖期间，针对“宪政主义”讨论的审查打击仍在继续。对该观念的讨论在和一羽毛尚未丰满的民权运动挂钩后，于2014年至少在一个平台上被禁止，意味着与宪政主义言论和讨论本身相比，社会运动被视为更具威胁的行动。据一项2014年的调查，即使赞扬政府的帖文，如果涉及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也会被审查。

删除内容

在过去，政府在内容管控方面一直不透明，2013年9月政府对国际记者说，“关于政府限制互联网的认知是不实的”。但2015年7月在本报告涵盖期间外，对公众发布的一项网络安全法草案，明确表示当局的任务包括进行此类限制。此立法宣称“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时，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上述信息，应当通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断信息传播。”

不过，审查决定是随心所欲、不透明和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涉及众多个人和作业程序。黑名单不时在网上被泄漏，但并不是正式发表，而且没有正式申诉的渠道。对审查的批评本身就是要被审查的。

长期以来，反色情和反谣言运动是审查社会和政治内容的借口。2015年1月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关闭微信上据称传播歪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信息的133个公共帐号，微信的国际版本名称为Wechat。据路透社报道，3月25日，微信发表了新的公告，概括了微信上禁止的内容，特指明显色情淫秽的内容，但也禁止有关“一夜情故事，换妻，性虐待和其他有害的信息”。

移动服务提供商监视短信并删除色情或其他“非法”内容。用户报告在被禁关键词的地方出现的是空白信息，而什么样的内容被禁似乎不同。

如TOM-Skype 和 QQ等即时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中包括定期自动下载关键词黑名单的软件。其他公司雇用审查人员来删除帖文，有时在它们尚未被公众看到之前就被删除。专家说，这些员工收到包括短信、即时信息、电话和电子邮件在内等有关审查的指示，每天最多可达三条。据媒体报道，这些指示大多数来自当地宣传部门。但是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四家微博公司的办公室设立党支部，以督促执行情况。2013年11月在西藏发表的文章中，当地党的领导承诺设立党的分支机构或者派出政治指导员在网站办公室进行意识形态教育。

省一级的警方也有权给当地的公司发关闭通知。2014年4月，中国地方媒体和国际媒体报道，海南省互联网警官魏一宁因接受280多次贿赂给设在海南的天涯和凯迪论坛发类似通知最近被判监禁10年。这些贿赂是其他司法权辖区的网警给予的，本来这些地方的网警应该给魏的部门提出删除内容的请求，但他们贿赂魏，因而能够通过即时信息直接通知相关公司。湖北的一位同事一年就贿赂他48.3 万元人民币（约相当于7.8万美元）。

其他的内容则由民营部门删除。2014年6月，设在北京的财经杂志报道，中央电视台一位因受贿被调查的主管曾要求网站运营商代表其他公司删除帖文。据一项分析，搜索引擎也删除或者凸显搜索结果，可能是为了抑制有关他们自己行为的负面文章。

2015年3月，因详细记录中国空气污染而被大量喝彩的纪录片 *穹顶之下* 在被广泛关注后，被从中国国内视频分享网站删除。该纪录片仅在腾讯网站上就拥有1.5亿以上的观众，且得到环保部长的好评。

媒体、多元化和内容操纵

网络新闻工作者经常进行自我审查。发布被禁内容，或其内容涉及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高官或中国现在和过去行为的编辑与记者，都面临纪律警告、失业或甚至被刑事拘留的危险。2015年，当局警告网络新闻提供者要加强检查，并在4月份威胁暂停入门网站新浪，因为该网站没有阻止违规。5月份，新浪发表了一份“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媒体名单。

宣传官员还操纵网络内容，指示互联网新闻网站扩散国有媒体的内容。例如，据报道，在本报告涵盖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下列指示：“各媒体不得对[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有关该纪录片的]舆论调控。”

自从2015年以来，各级宣传单位一直在训练并雇用网络评论员，即通俗所说的“五毛党”，来发表亲政府的言论并影响网络讨论。这些评论员还举报发表冒犯性言论的用户，用负面的评论来抹黑批评政府者，或者故意针对某一特定事件混淆是非。协调安排的诽谤活动被用来伤害著名的批评政府人士的名誉。

2015年1月泄露的一个文件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拥有35万“共青团网络评论员”，他们的任务是劝说学生反对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招募工作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一工作还扩大到包括推特等在中国境外、但实际上在中国国内被封锁的社交媒体运用软件。大约2500个“五毛党”在推特上互粉并转推他们自己的推文，以混淆并误导公众。2014年7月，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揭露，宣传人员在推特上设立了许多假帐号以美化中国的西藏政策。他们还设立了其他的假帐号，企图诬蔑不同政见者，著名的作家郝群就是其中之一。以笔名慕容雪村著称的他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网络上都颇具影响力，但是他在新浪的微博帐号却在2013年的清洗中被删除。

不过这些方法并非总是有效。许多政府雇用的评论员更关心的是完成自己的定额，而不是展开具有说服力的辩论，且网络用户也对内容操纵小心谨慎。公司也用钱来收买“草根营销”，即收买推销自家产品或服务的正面评论，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网络内容的信任。（商业评论员即通俗所说的“互联网水军”。）但是在2015年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启动“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运动，打击那些收费删除负面帖文的公司。

2014年3月，国有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最新一轮针对包括警方和司法部门在内的政府机构官员进行的互联网监管培训课程。这些课程收费6800元（约1108美元），可颁发从助理到资深经理等五项资格证书。政府公务员也公开鼓励民众参与网络讨论。2013年10月，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一位舆论监测官员说，传统媒体和政府官员，或实体微博帐号的发博量已经超过了拥有大量粉丝的著名意见领袖，即所谓大V们的发博量。

民族主义与仇外心理是中国网际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针对合理的不同政见、而不是煽动性讨论为目标的审查是否放大了它们的影响仍有争议。2014年3月，台湾学生占据立法院抗议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之际，微博说接受调查的微博用户中，60%的受访者认为该行动“不理性”，但微博却对将该事件与中国1989年的学生运动相比较的博文进行审查。

不过，网上讨论政治却可以很活跃，甚至包括民主与宪政也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2005年领导者对于民主执政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执政”。一定数量的公开讨论也允许官员监视公众情绪，暴露“敌对”思想而不触发审查，且可进行内部权力斗争。据

一项报道，新浪雇用的审查者允许“更多讨论民主和宪政主义的空间，是因为领导想让相关讨论继续下去。”

从商业上来说，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因为封锁外国社交媒体而受益，但是作为获得执照要求的一部分，这些公司必须防止传播被禁止的内容。中国公司的主管也享有政治保护。

到2013年1月，中国一半以上的互联网用户都注册了微博帐号。许多公司都提供此项服务，但最著名的是新浪微博和腾讯的微信。2013年4月，新闻单位被告知设立官方微博，须向政府主管单位备案。

微博的明显功能是其回应个人帖文而发展起来的评论链；一旦原始帖文被审查，则相关的评论链就会消失，而且该功能也可能被关闭，以防止某一帖文获得更多关注。2014年3月，新浪在给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招股书中说，拥有1.29亿月活跃微博用户和6100万日活跃用户。不过一项来自香港的调查说，大多数的帖文都是10%的用户产生的，而成千上万的其他帐号则是为营销而设立的僵尸帐号。目前已经收集了许多新浪努力管理微博内容的材料。据报道，新浪雇用了150名员工12小时轮班删除个人帖文或者帐号，通常冒犯性帖文在发表24小时之内就会被删除，有时候则发表很久以后才被删除；或者只让帐号所有者看见其帖文；并亲自警告个人用户。另外，成千上万的词汇随时被从微博搜索结果中自动过滤。

2012年微博因为未能阻止“谣言”而被惩罚，其某些功能被限制。2013年，在一场日益加剧的反谣言运动后，微博说在10万个因为骚扰和其他违规被禁言的帐号中，关闭了一千个提供不实信息的帐号。据估计，该平台上的活动减少了70%。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38%的微博用户已转至微信。

2015年，腾讯报告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微信月活跃用户总共达到五亿个。一些维权人士喜欢微信，因为用户可以选择限制升级以保持封闭式的关系圈，而且还可以传送能够避开审查的语音信息。不过该服务仍然监视和限制政治内容。在用户所说的 2014年3月的“大屠杀”中，微信关闭了数十个帐号，其中包括调查新闻工作者罗昌平运营的帐号。此事刚好发生在本报告涵盖的时间之前。

尽管有技术过滤、强制自我审查以及操纵，但互联网仍然是新闻和论坛讨论的主要来源，特别对年轻一代更是如此。中国网络空间充满网上拍卖、社交网络、自制音乐视频、游戏和对某些社会及政治问题的热烈讨论。虽然政治组织、少数民族、受压宗教团体公开利用互联网传递被禁止的内容，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也报告用电子邮件向中国订户发送新闻、有关翻墙技术的说明或被禁的出版物，但他们的代表明显仍然不多。从事慈善事业、教育、健保及其他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通常在网上有很活跃的表现。

用户用在不同的网站开相同的博客、直接通过绕开中央服务器的对等网络传递被禁止的信息等方式与审查系统斗争。用图像、语音和视频文档传递文字内容以避开关键词审查。用诙谐的新词、各种异义词和神秘的隐喻词来替换被禁止的关键词，迫使审查者对“老虎”这样表面上毫无恶意的词也要进行过滤。这种版本的中国互联网作为“一个准公开空间，在那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持续被以政治讽刺、笑话、视频、歌曲、通俗诗歌、顺口溜、小说、科幻、暗语、嘲弄和委婉语等形式被揭露、奚落和批评，”不是很像被压制的信息环境。

数字行动

“网络公民”（Netizen）这个词，中文直接翻译成网民或互联网公民，传达了公民合法参与网上交流的意思。微博扩大了这些动能，给很多中国用户带来了强烈的增权感，虽然他们面临审查。中国公民历来只能艰苦跋涉到官府才能喊冤，数字技术使他们能够克服地理、经济、和体力上给申冤造成的各种困难。而且，尽管领导人害怕集体行动，官僚们仍会屈服于公众压力。低级别政府所干的坏事一旦被用户曝光，常常会受到惩罚，在娱乐活动中或名牌手表上挥金如土的官员们经常被点名，因为这是可能存在腐败的迹象。官员们的确在寻求评估公众情绪，且同时也受到公众情绪的影响。

网络行动在中国造成的改革效果是不容否定的，然而网民和官僚之间的激烈冲突通常并不带来系统化的改革或民主决策。结果，他们不能保证有意义的问责。如果网络变得太轰轰烈烈，或者牵连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执政，审查者就会干扰。去年，一些非政府组织发现用电子商业平台募款受到阻碍，其中一个乡村图书馆项目就在2014年9月被迫关闭。

2015年4月，为释放因散发传单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而在3月被拘留的五名妇女活动家的网络活动声势逐渐壮大，通过私人邮件和加密社交媒体信息系统传递消息，募集到一千多人的网络签名。这几名妇女虽于4月13日获释，但仍在监视之下。

侵犯用户权益

一些刑法和互联网规章诱惑用户在网络上张贴中共不欢迎的内容。当局用反色情和反谣言运动作掩护来压制政治敏感的材料和声音。用来使不同政见者线下禁声的典型指控，如颠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诽谤和“寻衅滋事”等也常常被当作借口，用来监禁从事网络活动的公民。喧嚣一时的“实名登记制”一直是对用户隐私权和匿名权的威胁，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监视已经加强。网站、托管服务业者以及不同政见者的个人电子邮箱常会被中国的黑客攻击。

法律环境

中国宪法第35条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但这些权利都从属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此外，大多数情况下，该宪法不能在法庭上作为确认权利的法律基础。司法不独立，而是紧紧追随党的领导，特别在政治敏感的表达自由案件中更如此。中国缺乏具体的新闻法或互联网法，而由政府机关颁布规章，建立审查指南。这些规章，可以是高度机密的，可以不断改变，还不能被法庭挑战。检方利用中国刑事法，印刷出版法，颠覆，分裂主义和反恐法，以及国家机密法等模糊不清的条例来监禁从事网络活动的公民。

这些指控的法律基础在2013年得到强化。9月份，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项司法解释，此项名为“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明确诽谤、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和敲诈勒索等罪名适用于网络表达行为。地方官员已经以刑事诽谤拘留了在网络上揭发腐败内幕者，如情节“严重”可判三年监禁。但是新解释也将同一诽谤信息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情况包括在内。根据此解释，被认为可引发混乱或抗议的网络信息也将遭到刑事惩罚。

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定期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网络言论权利。2014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居民汪龙控告中国联通，称在2014年5月开始的封锁期间，其网络无法登入谷歌。深圳福田地区地方法院于2014年9月受理此案，是这类案件的首例。虽然许多法律挑战缺乏取得成功的资源或政治支持，当年4月，广东一个地方法院曾责令当地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重新处理2007年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提交的申请，但该委员会拒绝向浙江的一位律师公开资金分配记录。这位律师成功地提出起诉，迫使该委员会重新考虑其申请。

对网络行动的起诉和拘留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收集的文件，截至2015年9月，中共监禁了84位网络公民。

在最近几年，为减少抗议和“社会和公共秩序”可能受到威胁而采取的一系列镇压行动中，网络公民及维权人士遭到拘留。受影响者包括许志永等利用社交媒体倡导文明社会的律师，以及被控“传播网络谣言”的著名网络评论家和博客作家。

2014年4月24日，当局拘留了70岁、给德国新闻机构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供稿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高瑜，称她“泄露国家机密”。官方媒体指称高将中共中央的一份机密文件交给境外网站全文刊登（据信就是内容警告官员警惕社会上包括人权在内的“七大颠覆性违纪”的九号文件）。2014年11月21日对她进行了闭门审判，但是裁决直到2015年4月17日才下达，高被判有罪，监禁七年。

维权律师浦志强在 5月3日参加了纪念天安门广场镇压25周年的讨论会后，于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拘留，6月13日被正式逮捕，对他的刑事指控包括寻衅滋事等。证据是他在2012年7月到2014年5月之间在微博上发表的28篇文章，这是检方的唯一证据。浦被监禁一年以后，检方宣布应当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检方未立即公布审判日期。

香港2014年9至 10月的亲民主抗议示威引起又一波的逮捕行动。近24人因表示支持不断扩大的抗议示威被拘留。深圳的维权人士汪龙曾于2014年控告中国联通审查谷歌，他转发了关于这些抗议示威的新闻报道，于2014年9月27日以“寻衅滋事”指控被拘留。

在所谓镇压散布网络谣言的运动中，数百人被拘留。在2014年8月，国家当局宣布逮捕了四人，另拘留了81人。住在云南拥有五万粉丝、并以批判共产党官员、警察暴力和环境公害闻名的博客作家董如彬，于2014年7月被判六年半监禁。

跟过去几年一样，宗教和少数民族网络活动受到特别严厉的打击。2014年7月，一位22岁的维吾尔族男子在新疆叶尔羌（莎車）县暴力冲突后因“传播谣言”被拘留。这位没有被公开姓名的男子是乌鲁木齐居民，他在网络上的一篇文章中指控中国公安民警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并把这篇文章上载到一家海外网站。叶尔羌的互联网服务被关闭，国际观察家被拒绝进入该地区。

2014年1月，教授、作家、维吾尔维权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他北京的家里被拘留。伊力哈木·土赫提稍后被指控在他创办的网站上传播谣言，煽动民族仇恨，从事分裂主义活动被判有罪。在特别极端的案子中，分裂主义指控可能被判死刑。2014年9月，他被一家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七位帮助他做网站的学生也于2014年12月因分裂主义指控，分别被判监禁三到八年。

8月，西藏博客作家达瓦措姆（Dawa Tsomo）在批评政府对2010年大地震后仍然居住在玉树的藏民福利和生活条件处理不当之后被拘留，对她的指控是“违犯中国互联网规章制度”。她在拘留之后下落不明。

长期被拘留者中包括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因在网站发表包括亲民主的08宪章等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被判11年监禁，目前仍然在服刑。至少有两名维吾尔族网站经理买买提江·阿布杜拉（Memetjan Abdulla）和古丽米拉·艾明（Gulmire Imin）在2008年西藏暴乱和2009年新疆暴乱的余波中被终身监禁。当时地方法院，通常是在闭门审判之后，至少关押了涉及报道西藏或新疆问题网站的17人。

虽然被监禁的人在总用户中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但对他们的严厉判决使得组织严密的维权和博客社区凄凉心寒，并起到鼓励更多的公众自我审查的作用。审判和听证会缺乏正常程序，通常仅宣布判决书而已，而且被关押者通常报告在关押期间受到包括折磨和缺乏医疗照顾等虐待。

在国人呼吁改革之后，中国当局于2013年取消了被称为劳动改造的超法律判决。然而，不经审判就被拘留在戒毒所和“法治教育”中心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些地方的情况很差。互联网用户也成为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拘留的受害者。至少有一名叫李启东的被拘留者，他在网络文章中批评政府后于2009年被官员送进辽宁的医院，至今下落不明。

人们还被国安人员劫持并拘留在秘密场所，而且并不通知他们的家人或法律顾问。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改案。该修改案强化了把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威胁者关押在秘密场所的法律基础。作为对公众的回应，增加了要求警察通知被拘留嫌疑人家庭的条款，但并不要求披露嫌疑人被拘留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被拘留的原因。虽然有此改进，但该修正案仍然保留了可以被警察和安全人员滥用的模糊语言。2014年4月，新浪负责过滤其电子出版内容的17名员工的家属被告知，这些员工因公在国外一个月，但当地新闻机构5月份报道，这些员工其实是被拘留。2015年，包括许多代理言论自由案在内的数十位维权律师失踪或被秘密关押。

监视、隐私和匿名

由于实名登记要求扩大到网络、移动电话零售商及公共互联网设施，因此希望避免因网络活动受到打击的用户可以匿名通讯的空间越来越小。当局称实名登记可以防止网络犯罪，然而专家认为，上传个人证件其实更易遭受盗窃和滥用，特别是有些认证过程是通过鲜为人知但与政府相关的合同者完成的。

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新规，加强了网站和服务提供者要求实名登记的法律基础。此规定威胁违反者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或者取消备案、关闭网站”，这极大地回应了整个行业已经非正式实施的做法。主要新闻门户网站的评论部分，布告栏，博客托管服务，邮件提供者已经实施了一些登记。工信部还要求网主和互联网内容提供者，无论网站属于个人还是公司，在申请执照时都要提交照片证件。尽管如此，2012年的这些规定延伸到商界，要求他们在收集个人电子信息时，必须得到用户的同意，并明示信息收集的“使用、方式和范围”。这些规定并没有对执法需要这些记录的情况提供保护。

微博提供者很难进行身份认证检查。有关新浪微博用户买卖失效身份证号以便做假登记的网络报道说明很容易绕过该项要求。新浪2014年向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如果不执行此项要求，公司将可能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处罚”。实施实名制政策也使

政府雇用的评论员更难于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运作。一项研究报告说，官员们鼓励评论员利用假名或假证件掩盖他们和宣传部门的关系。根据2014年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发的临时规定，对“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提供公众信息服务”者，服务提供者要核实用户的身份，并在政府机关登记备案。

2015年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从3月1日开始，政府将对所有网站真正实施实名制登记。据报道，阿里巴巴集团、腾讯控股、百度、新浪下属的微博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从各种平台删除了六万多账号，因为他们不符合更严厉的新规。

2014年11月公布了一份反恐法草案并徵求公众意见。其中一条款要求科技公司给政府提供进行监视的“后门”，并向执法部门提供加密密钥和用户数据。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信公司都必须在中国境内储存用户的数据。截至2015年5月，该草案仍然在讨论之中。2015年底，在本报告涵盖期间外，新闻报道说中国官员直接要求美国科技公司，寻求通过后门获取中国用户的数据。1999年的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以及2006年以来的相关规定，都已经要求外国和中国国内公司的加密产品必须经由政府监管机构批准。

互联网商业对网络匿名也起到破坏作用。为了在社交媒体网站进行金融交易，许多用户主动提交个人详细资料。自从2010年以来，购买移动电话已经要求提供身份证件，因此提供电话号码就成了注册其他服务的一个普遍办法。据一位分析家估计，至2012年，50%的微博用户只要从手机登陆到服务提供者的平台，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尽管过去并未始终如一地执行，但从2015年初起，就已经开始打击利用非实名手机替代实名制登记的做法。

由公安部门管理的中国“第二代”全国身份证，要求增加数字化的指纹；第一代身份证从2013年失效。国务院意图把信用卡、社会安全以及其他个人信息同这些生物统计数据库连接起来。作家莫之许描述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后果。他说，“从网络上搜来的身份证号码很快就会因重复使用而不再有用武之地”；“亲朋将不……敢把身份证号借给任何人”；“居民信用信息也必然含网络使用相关信息。”2013年，一名维吾尔族博客作家报告说不能用他的全国身份证号加入微信体育页面，因为身份证显示他的出生地是新疆；他用一位汉族朋友的号码才能登记上。

中国提供者被要求保留用户信息60天，且若当局需要，在不经司法监管也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就必须提交。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保守国家秘密法，要求电信业者和互联网服务商在调查泄露国家机密案件中与当局配合，否则有吊销执照的危险。2013年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引入了一种复审程序，允许警方监视嫌疑犯的电子通讯，这是公安部在许多种刑事调查中允许的，但修正案关于复审程序的用词却含糊不清。

中国法律对隐私的保护是很小的。用一位专家的话说，法律明确授权政府获取民企拥有的数据，一旦电子政府策略全面实施，“有系统地进入”获取“任何人掌握的数据”是实际可行的。

实名登记只是在中国普遍监视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的一个方面。法院文件显示，用于审查的深度包检测技术也被用来监视用户、个人短信和即时信息交流。一项学术研究报告说，用户在百度输入黑名单上的搜索词时，他们的互联网协议地址就会自动被传送到公安部下属的上海某处。网吧会检查照片证件，记录用户的活动。据报道，有些地区网吧的视频监控器材会把图像发送到网监分局。不过，鉴于这些手段的隐秘环境，很难证实这些做法。

如审查一样，监视系统也是偏重于针对被认为是反政府的个人和团体的。2015年1月，新疆政府颁发一项新规定，要求维吾尔人在购买手机、电脑和其他具有储存、通讯和广播功能的电子设备前必须实名登记。销售这些设备的商店也被要求安装能向警察提供实时电子交易记录的软件。

恐吓与暴力

中国被拘留者中盛传各种折磨和超法律的虐待，对政治犯更是如此，言论自由案中的大多数都属政治犯。2015年5月，人权观察组织在对数百起普通刑事案件的分析中报告，[曾遭拘押的人描述了他们]“在公安讯问时遭到肉体上和心理上的酷刑，包括以手腕将全身吊起、用警棍或其他物品殴打以及长时间剥夺睡眠。”该报告说，“政治犯.....遭遇到本报告所描述的许多状况，甚至常常更加严重。”

互联网用户还有遭软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包括2010年以来对诗人刘霞（刘晓波的妻子）超法律的软禁在内，互联网和手机通讯通常被切断，以防止被软禁者联系支持者和新闻工作者。虽然有好几起长期软禁的案例，具体情况和禁闭程度可以随意改变。有些团体试图监测有多少不同政见者被软禁，但尚无统计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人因为网络活动而成为软禁目标。

执法官员常常传唤人讯问其网络活动，这种恐吓策略被委婉地称为被“请喝茶”。维权人士在敏感的政治事件期间也会被指示外出旅行，有效地使他们不能进行正常的网络上或网络下活动。

2015年7月，至少有159名律师被讯问、拘留或失踪。维权律师王宇7月9日报告她的互联网服务和电源都被切断，之后不久有人试图闯入她家。直到10月，她一直被隔离拘留。

技术攻击

中国是全球网络攻击的源泉，据2014年Akamai调查，全球41%的攻击流量来自中国。该调查沿攻击所用互联网协议地址追踪，发现进行攻击的电脑在中国，这意味着这些电脑本身可能已经被在其他地方控制。

源自中国的攻击尽管很难直接追踪到这个国家，但这些非法网络活动的范围和目标使许多专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得到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资助或许可的。受攻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多样化地理分布显示一种模式，即黑客的目标与中国的国家目标始终是一致的。2015年，以中国为基地的攻击目标包括谷歌、雅虎、微软和苹果在内的国际公司。

Hacker，中文称为黑客（黑色客人），利用各种不同方法干扰或截取网络内容。报道中国滥用人权的中国国内及海外团体都遭到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DDoS），这种攻击利用大量无法处理的流量轰炸托管服务器，从而导致网站暂时停止运行。从2015年3月25日到3月31日，托管服务业者GitHub遭到DDoS袭击，其服务因此瘫痪。消息来源指称，该攻击来自中国。监测组织公民实验室分析了这次事件，发现“尽管这次攻击的基础设施与防火长城同在一处，但攻击本身是由我们称之为‘大炮’的另外一个攻击系统执行的，其能力和设计都不同。大炮不仅只是防火长城的延伸，而明显是另一种攻击工具，它劫持进入（或可能是来自）某一互联网协议地址的流量，而且还可随意把未加密的内容当成中间人攻击。”

2015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被发现给许多域名发了假的数字安全证书，其中包括谷歌拥有的几个域名。这一安全漏洞会导致遭受中间人攻击，攻击者能假装为应被授予证书的网站，从而获取个人和私人信息。2014年香港抗议示威期间，雅虎受到中间人攻击，微软的Outlook电邮也在2015年1月受到一次类似的攻击。2015年4月，谷歌和Mozilla都宣布他们将撤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颁发根证书的资格，这意味着他们的浏览器将不承认拥有这些证书的网站，因此有可能中断用户和包括银行和电子商务平台在内的一系列网站的联网。

另一种记录详尽的策略是鱼叉式网络钓鱼，这种方法利用貌似专为收信人写的电子邮件来诱骗收信者点击某一链接或看似合法的附件，以达到骗人下载恶意软件的目的。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受监视的人常常是这种通过电子邮件传送、并在用户设备上安装间谍软件的程式攻击的目标。其他网络攻击则影响更广泛的人群。